

年终于于紧赶慢赶完成学业，回到了上海。和早前遥想过很多次的毕业游不同，我最终哪儿也没有去，而是像往常每一年的年末一样，周游于大学研讨会。有天早晨出门去新竹清华大学，出门的时候天还远没有亮。我想起来许多年前至少有两次，我从宿舍出门搭公车到汽车转运站，也是这样清晨的气味。那时我不到25岁，不断赶路，又不断等待，生命的延续像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兼差。在等车的二三十分钟里，总是那么无所事事，所有的社交门户，都没有新的消息。因为过于沉静地坐在塑料长椅上，没有心事地等待着破晓，更像亲历着神秘的仪式。

其实只要离开了台北，这种莫名其妙的沉静就容易蔓延。我还记得几个遥远的瞬间，在鹿港、在雾峰、在埔里、在清水……我还是一个蛰居在岛屿中部、普通的游人，还充满好奇，无论在烈日之下，还是冷空气中。短短几年，变化如此大，在

一望无际中，甚至有一点懂得，“迁客此时徒极目”的枉然。而不是，惘然。

十二月末的台北还没有太浓烈的过年气氛，只是圣诞已逝。对我而言，每一帧都将是好久不见。然而就连这样的事都很普通，离别也许太难不同。在高高的游览车上路过

的大坪林、龙潭，直至静美的竹科，沿途历历在目，腾空的颠簸，由晦暗到苍茫的黎明，由纷繁到齐整。这些地方下一次要见到，很可能要在梦里。我每次这样想，都不感到害怕。这更像一种“登出”，我“登出”我的20岁，“登人”30。“登出”台北，“登入”新竹”。黄昏时走出电影院，见到远处落日如灭点，一样的端详，一样的越界。话语本身如扑朔迷离的景观，好像雨降落的时候，才知道远山与双目之间曾经隔着坚硬的玻璃镜面，倒映出虚幻的打湿的脸。那些年，我曾“登入”过一张脸。

上海呢，则是扑面而来的冷，全靠心里的热量保护周身的

温存。我喜欢我家周围并不那么日新月异的气势，这会令我感觉到温馨。可偶尔出门，依然会感觉到这些年的变化，像微生物一样在人的日常生活里悄然变异。有天从地铁站出来，打不到车，

我上了一辆小电瓶车，司机是启东来的，开一半他突然说，“姑娘你赶时间吗？”我有点愕然，跟着他兜兜转转，心里很疑惑，但还是去了。没想到他的家是一片花店。店中安静盛开的花朵，一点都没有威胁的气息，反而在寒风中显得萧条。这家花店看起来生意并不好，但外观却美好。我不忍心苛责，他曾耽误我那些并不重要的时间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开花店还要做这个生意吗？”后来司机在寒风呼啸中硬要跟我上聊天，自顾自说“还是生女儿好啊，我儿子结婚花了两百万，彩礼名目繁多，给丈母娘的‘肚皮痛钞票’要一万八千八”。我问啥叫“肚皮痛钞票啊”，他说就

是丈母娘生女儿肚子很痛，我问没有专门一个词吗？他说专门的呀，“肚皮痛钞票”……寒风呼啸而过，一条马路都听见了。说起来，这到底是一件喜事，喜事中又有一种“不容易”。特别像过年。

这样的事不胜枚举，有时反倒让人觉得比和亲眷在一起说话更平安。如今大家都在网上买年货了，快递小哥们回家过年，哀鸿遍野。

昨天有个快递在电话里对我说，“我找到了你家的窗子，我把东西丢进来了哦。”我问：“哪一扇窗子啦，喔我看见啦。”他说：“你在家呀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你怎么不按铃。”他就笑了。我没见到他，他也没见到我，只有声音，彼此打了一个忙碌的、虚拟的招呼。他也很忙吧。我心想，他们什么时候回家呢？

总有一些离别，有点像出发。又有一些重逢，开口就像道别。机场、火车站中不知是逃往过年还是逃离过年的人们，都满怀心事或希望。如屋舍俨然，如阳光明媚。

公司同事收到的小礼物是几个福字斗方，正好打扫卫生的阿姨巡楼经过，就送了伊一张，伊眉开眼笑。我看到发出来的照片，就也眉开眼笑，比送了我还开心。

阿姨和她老公是“胡建”宁德人，说的话有很重的乡音。我的好几个大学同学来自省会“胡州”，身边好友不乏台湾郎，时不时还听江蕙和施文彬的歌，对那个口音很亲切，别人一头雾水的时候，还是颇能连猜带蒙的。

阿姨和阿叔对我很好，上次刚刚分我吃伊拉儿寄过来的李干（以前大学同学也从福清老家捎来过，清爽又有滋味，超市货完全不能比的舌尖上的零食），前几天又捏了一个纸卷过来——拌了花生的米花糖。我的工位在最角落，阿姨歇脚的地方在最外面，伊颇走了一点路进来的，又一定捏得蛮紧的，因为有的地方糖有点儿化了，把纸都黏住了。

但是我并不是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才说他们好的——吃东西固然要紧，我也爱吃百家饭，视之为传统美德，但是和别的正事一旦发生冲突时，原则就是一码归一码，分得还是很清楚的（此处请脑补天秤脸）。

他们最照顾我的，是我的怪癖——我的垃圾桶里，永远是用薯片袋子、快递袋子之类用过的袋袋装垃圾，托底的袋子用的还是以前桶装水外面套的那种极薄的大塑料袋（扎了一头套在垃圾桶上，还套了两个，因为实在太薄了，完全不晓得有什么实际功能，所以后来看到取消了这个设计，真的是很欣慰的）。别人的垃圾桶套的都是制式的黑色垃圾袋，如果垃圾都是干的，阿姨和阿叔就把东西倒在一个大纸箱里（这纸箱也是谁收了快递以后不要的）；但是帮我收拾的时候，他们会把垃圾袋的垃圾倒干净了再给我放回去，真的让我很不好意思。所以现在会尽量注意在收工的时候顺手就带走，避免让自己情何以堪。

子曰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（不一定是孔子吧，反正重点是表尊称，跪求《咬文嚼字》放过）。我也分东西给阿姨吃，“红宝石”的奶油小方算最拿得出手的了，但是和他们给我的比起来，还是不够“大自然的搬运工”。从

工位去水房烧咖啡洗杯子的路上（我不在水房，就在去水房的路上），看到一星半点的垃圾，我会顺手捡了带走，算是另一种回馈吧（古龙说四川唐门长媳也有这习惯，可惜余生也晚，无法讨教了）——阿姨和阿叔虽然巡得勤，但是架不住人东西多，有的人又不那么care（在乎）这些小事，所以难免会有遗漏——据说垃圾都是放错了的资源，所以称遗珠亦可也。

俗话说“万事开头难”，我倒是觉得开头一点都不难，难的是收尾，如何把放出来的东西收回去。有句讲句，我自认算是颇有公德心的良好市民，可遇到垃圾分类还是会一筹莫展（此处再请脑补天秤座选择障碍脸）。还好有阿姨和阿叔这样帮我托底的人，谢谢他们。

托底

马塞洛



“原乡杯”作文竞赛发奖仪式，金志浩没出席。他和我都是评委，怎么回事？当晚打电话询问，电话是他爱人接的，回答说：“走了。”什么“走了”？原来当天凌晨，他因患肝癌不治，殁于自己家中。也算寿终正寝吧，但毕竟只有75岁，走得还是早了些！

于是联想到，我们这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被聘定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，如今又少了一个。从五六十岁到七十多岁，女的如徐振维（市教研室）、何珉珂（嘉定一中）、杨墨秋（复兴中学）；男的如陈钟樑（市教研室）、方仁工（市北中学）、杨峻岩（市东中学）、金志浩（曹杨二中）……一个个陆续离开了我们。他们的音容笑貌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，令人不禁怆然。

然而，同时却存在着另一个现象：语文特级教师中最年长的几位却都还健在。交大附中的沈老（蘅仲），早已过了九旬，正在向百岁老人进军；复旦附中的卢元，也已过了九十，还在整理出书；嘉定二中的钱梦龙，该过了“米寿”（88岁），仍精神矍铄，常参加研讨活动；最了不起的是于漪老师，她也要八十四五岁了，而且动过几次大手术，但她作起报告来，仍激情满怀，侃侃而谈，一两个小时不在话下，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。这些德高望重的前辈能如此健康长寿，真是我们的福分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这几位前辈能如此健在，而那些一些离我们而去的同伴们却会陆续早逝呢？将二者比较一下，能否对我们甚至对如今的中青年同行们有

些什么启示呢？

我觉得，不妨从两个角度试着作一些思考。

一是两代人所处环境和各人经历不尽相同。我

前辈和后人

过传忠

们这代人年轻时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较差，身体健康的底子打得不够结实，而承受的各种压力却不少。待到长大成人后，所担负的责任更重，大多都要“双肩挑”，又要抓业务，又要管行政，所付出的心力常常超过负荷。而

“文革”结束进入改革开放之后，积极性更被大大调动起来，校内、校外、市内、市外、活动空间大大扩展，探索领域也千变万化，往往对健康注意不够，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就透支了。而几位长辈虽大我们不多，却错开了社会发展阶段，底子打得比我们好，经验也比我们丰富，待人处事都比我们适应性强，虽谈不上游刃有余，也要比我们灵活得多了。

再是两代人有些理念、认识与习惯有所差异。我们相对年轻，处在“左”的思潮泛滥，遇事比较激进的时代，往往不

甘也不敢“落后”，蛮干、硬拼、不讲科学，少实事求是，常常难以避免。这当中虽然也不乏可贵的进取精神，但事倍功半，付出的代价却是比较沉重的，包括健康的受损。而几位前辈，相对比较淡定、从容，进退适度，常常会更有效果和效率，这也是我们所不及的。

如今进入了新时代，中青年同行们跟我们两代人都不同了。时代的改变、科技的进步，使他们有更实惠的目标和更现实追求，讲科学、讲效率比我们明显进步，这都值得肯定。但前人的奋斗和实干精神仍不应丢掉，应加以传承和改进，融合在新的时代精神里，一定会使一代代人更好地成长，他们的寿命也一定会比我们更高。

先行的同伴们，请一路走好；各位前辈，请多多保重；后面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，语文教学改革的担子压在你们肩上，祝你们完成得更出色。



伤害

舒非



维港浪花

有老同学在群组里说：言语伤人，甚于刀剑。她的感慨，使人觉得有可能是被闲言闲语伤害了，心中愤愤不平。群组发言，每个人都只是三言两语，话题常常一带而过，很难有深入探讨的机会。假如大家是坐下来喝茶聊天，面对面，我就会规劝这位昔日同窗，年纪不算轻的我们，早已到了另外一个人生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其实不必介意别人怎样说你，怎样看待你，最要紧的是，自己怎样看待自己。

年轻的时候，尤其像我们这样在小岛上出生和成长的人，都很爱惜羽毛。容不得别人一句不好听的话，人人自尊心很强，特别爱面子。小岛人口只有两万多一点，一条街，左麟右李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相识，就因如此，更加怕别人闲言闲语，更怕别人讲坏话，令清誉受损。

现代社会可不是这样的。在香港，同一栋大厦，同一层楼，几十年的邻居，关起门来互不相干，没有人关心隔壁张三李四是干什么的，讲任何的闲话都没有作用。社会的模式肯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，不可能停留在我所说的传统年代。

自己的事自己做主，跟别人毫不相干，最重要的反而是所作所为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良心。只要心安理得，管得了别人怎么说？我的原则是不伤害他人，也不能被他人所伤。

我问，打算让圆圆报考哪所大学？岂料，表妹索性说不管了，现在什么也不想，只想趁着六月份快点到来，熬过这段日子，考什么大学随便啦。已经到了不计结果，只想熬过去

熬过去

周珂银

的田地，想必她已经筋疲力尽。

“熬过这段日子”，记得我有位朋友也说过同样的话，去年她儿子参加中考，她也同我说起过“熬”的经历。所幸的是后来她儿子考上一所市重点高中，朋友也算是没有白熬。学校还推荐她发言，向家长们介绍是如何培养孩子的。为此

她特向婆婆取经，因为老公当年也算得上是学霸，她婆婆也曾经骄傲地上台发过言。婆婆想了想，他们让我上台发言，我只说自己还是蛮注意儿子的营养问题，到了考试期间，每天早餐一个白煮蛋，有时候晚餐添一块红烧大排骨，再后来我自己想不出啥了，我就讲我儿子如何懂事，如何自觉，又如何聪明，总之是我儿子自己优秀，虽然讲偏了，但下面还是掌声一片。



金鸡报晓（剪纸）李守白作

今非昔比，婆婆的发言是过去式了，朋友觉得参考价值不大。轮到她上台讲了，她一开始先是肯定儿子自身的努力，接下来就是自己的陪读经历了。讲自己是如何陪儿子读奥数，如何一起听课，如何一起解题，又如何陪儿子奔波

在各种补课的路途中。讲着讲着，或许是想到自己平日里的辛苦，她说自己情绪难以自控，怎么感觉像在“控诉”，眼泪也差点落下来。

若是心甘情愿，又怎会想落泪，想来其中有着太多的无奈和委屈。孩子优秀是孩子的事情，她只想做简单的母亲，像她婆婆那样的母亲，每天一个白煮蛋，偶尔添一块红烧大排而已。然而以现在的情形，又怎么可能？其实朋友的儿子和表妹的女儿本来就是成绩优异的孩子，但作为家长的他们依然焦虑。他们像在密集的人流中被推拥着，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，似乎由不得自己。所以，在他们诉说“熬”的过程中，我唯有倾听，却不知该如何安慰。

七夕会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养育

表妹的一声苦啊！与苏三的慢板拖腔有

春节期间，照例要有一次亲戚们的大聚餐。按约定俗成的轮流制，今年我做东。于是，拟一条邀请函，一一发至各位亲属的手机。表妹即刻回应，今年不来了，圆圆功课来不及。我晓得她家眼下正处在“一级备战”状态，故不再客套地邀。

圆圆是表妹的女儿，今年的高考生。上月我去表妹家，原本见着我总是雀跃的女孩竟然闭门不出。走进她的房间，

见到了许多书本及练习卷子。圆圆从书堆里抬起头，一脸倦容，冲我笑笑算是招呼了，随即又潜入题海中。

表妹的一声苦啊！与苏三的慢板拖腔有

得一拼。现在的她不仅每天要陪读到深更半夜，为赶早读课，翌日清晨六点不到就得喊女儿起床。此时的圆圆还在熟睡中，她一边催促一边就掀起被头，先将袜子套在女儿脚上，再将她提起来套上内衣，如此，圆圆基本清醒了。表妹马上将牙膏挤在牙刷上，备洗脸水，待圆圆漱洗完，递上一杯热牛奶，又旋即铺床叠被，准备早点，然后乘圆圆背书包在门口穿鞋的空当，连忙出门先按下电梯，递上备好的早点。送好孩子上学，再准备自己上班，如此紧锣密鼓的节奏听得我瞠目结舌。不仅这些，表妹还打开手机，让我看她下载的各种关于高考的信息，动态情报，需要填写的各类表格等等。

圆圆是表妹的女儿，今年的高考生。上月我去表妹家，原本见着我总是雀跃的女孩竟然闭门不出。走进她的房间，见到了许多书本及练习卷子。圆圆从书堆里抬起头，一脸倦容，冲我笑笑算是招呼了，随即又潜入题海中。

表妹的一声苦啊！与苏三的慢板拖腔有